

构建人生出彩的机会共享机制： 基于教育利益整合

◆阮成武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利益分化释放出的人生出彩机会是一种非均衡、差序化和多质性的分享。由分享走向共享,面临入学机会供给、教育结构衔接融通、教育-就业衔接上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此,教育改革应当促进教育利益整合,破除教育利益分化所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教育系统的一致性、融通性和整体性,构建人生出彩的保障机制、竞争性机会共享机制、融通性机会共享机制和协同性机会共享机制。

关键词 人生出彩 机会共享机制 教育利益分化 教育利益整合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6.17.004

当前教育改革面临的深层次矛盾,是新时期以来教育利益分化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诚然,教育利益分化凸显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利益主体地位,激发教育的动力和活力,扩大教育获得的利益空间,彰显教育成层功能,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分享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种分享是非均衡、差序化与多质性的,难以契合现阶段党和国家确立的共享发展理念和实现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新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1]“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通过教育利益整合,突破利益分化所形成的各种制度藩篱,增强教育系统的一致性、融通性和整体性,构建人生出彩的机会共享机制,是现阶段教育改革的必然进路。

一、教育利益分化:人生出彩机会的非均衡、差序化与多质性分享

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社会的利益结构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其基本特征是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绝对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同时在国家利益的协调与控制下,个体之间在利益上趋于平均化。”^[3]国家几乎支配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机会,如升学、就业、晋升等。在此背景下,教育利益高度整合、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导向、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形成地区、学校之间“全国一盘棋”的利益格局,不同学校及不同行业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利益差别并不突出。个人接受教育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而不是以人生出彩为目标和动力。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纵向流动的机会相对较少,且主要受到身份因素(阶级、户籍等)的制约。一是以阶级成分为依据建立的身份等级体系,“使各个阶层的人拥有不同的参政权利、声誉地位及活动自由度,尤其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上大学、就业、提干等方面而紧密挂钩。”^[4]高校招生名额向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工农干部、知识

阮成武/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 (芜湖 241000)

分子干部及产业工人等特定阶层倾斜;另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户籍。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个条例使农村学生唯有取得“学校的录取证明”方能进入城市,否则,农村学生即会被制度性地与城市区隔开来,毕业后回乡务农,进而失去社会纵向流动的机会。

改革开放实现了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深刻转型,社会结构分化带来各个领域的利益分化,教育也不例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立“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的思路,改革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从而结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6]此后,经过《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以及相关教育法律的持续推动,以教育利益分化为主线的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国家与不同地区、学校之间分化成为不同的教育利益主体,围绕着各种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分配与获得,形成由一定利益关系构成的教育利益结构。特别是中考和高考、毕业分配等制度的恢复和建立,促进了社会的纵向流动,激发了教育的活力与动力,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分享了人生出彩机会。但这种分享是非均衡、差序化和多质性的。

1.地区之间教育利益分化,实现人生出彩机会的非均衡分享

1985年的《决定》指出:“中央认为,在新的经济和教育体制之下,各地将有充分的可能发挥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潜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要承认全国各省市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要承认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范围内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所以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达到共同的提高。”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国家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将全国义务教育分为三类地区,分别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教育水平。与此同时,作为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利益资

源——招生计划和指标,中考实行县区定额制,高考实行分省定额制。各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配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6]由此,“全国一盘棋”的教育利益格局开始打破,不同地区(县区、省市)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利益主体。这一政策在调动地方办学和管理积极性、促进教育事业总体发展的同时,也使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拉大,教育利益分配的异质性增强,甚至出现地方保护、本位主义和政策壁垒。高考分省定额制、中考县区定额制,使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省(市、自治区)和县区,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明显占优势,中西部及其它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在户籍、居住地等条件限制下被制度性区隔了,不同省(市、自治区)和县区的考生在人生出彩的机会分享上存在严重的非均衡性。据研究,2009年北京大学对广东和安徽考生设置的门槛,比北京考生整整高100倍;上海考生进复旦大学的机会有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150倍、河南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7]

2.学校之间教育利益分化,实现人生出彩机会的差序化分享

新中国建立的学制系统是一个双重结构,在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和扫盲的同时,为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从小学到大学建立了一套以重点校为主体的精英教育体系。这一系统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1978年教育部《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提出,小学、初中、高中及完全高中与高一级学校招生数形成3:1的“小金字塔”结构,建立从国家级到县市区级的重点学校体系。1985年《决定》提出,对办学水平评估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重点支持。1993年《纲要》提出建设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即“211工程”);1994年《〈纲要〉实施意见》提出每个县重点办好一两所中学,全国重点建设1000所左右实验性、示范性的高中。此后高等学校又进一步启动“985工程”。与此同时,为适应经济发展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需求,缓解高考压力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决定》和《纲要》积极扭转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实行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级分流,形成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的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相比,

普通教育在招生录取批次、经费安排等诸方面都居于优先地位。由此,从国家级到省级、地市级、县级,形成从普通教育-重点、普通教育-非重点、职业教育-重点、职业教育-非重点的学校差序格局。

这种差序格局在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行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多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突出了学校的利益主体地位,加大了不同层级序列学校之间的办学水平分化和利益差别。学校走向利益独立化、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竞相追求各自的办学业绩和效益。不同层级序列的学校,录取批次和文凭的“含金量”大不相同,学生获得的就业岗位、社会地位和待遇也相差甚大。相反,就读于不同层级序列学校的中小學生,却要面对全省(市、自治区)和全县(区)统一的高考和中考录取分数线;毕业于不同层级序列的高校学生,同样要面临共同的就业市场竞争。学生进入重点学校就自然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更容易获得高的教育成就和更高含金量的教育证书和文凭,进而进入更高的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反之亦然。如果说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学校分层,导致不同学生的人生命运一次次分层,那么,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的普教与职教分流,则是在进行人生命运的一轮轮分轨。学生接受不同类型的教育,将迎来不同的职业目标和社会经济地位;就读于不同层级序列学校的学生,在人生出彩的机会分享上呈现差序化,在教育过程的分层与分轨过程中就实现了社会分层。研究表明,曾在重点高中就读的人相对于普通高中就读的人,能够显著地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平均增长4.3($p < 0.001$),并最终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8]

3. 个体之间教育利益分化,实现人生出彩机会的多质性分享

改革开放使阶级身份作为利益分配标准的体制机制逐步消解,户籍、票证制出现松动或被取消,国家对公民个人的直接干预和管控逐步减少,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自主性明显增强。在教育上,原先各种先赋特权被取消(如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代之以高考制度的恢复,个人努力、能力及知识水平等自获因素,在教育获得和社会纵向流动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全国统一高考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机制,点燃了万千学子通过上学和考试改变人生命运的梦想,无数青少年

由此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1985年《决定》改变统包统分的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确立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等三种招生方式,自费生交纳一定数量培养费,毕业后可以由学校推荐就业,也可以自谋职业。1994年启动高校并轨招生,学生从统招统分到自费上学、自主择业。由此,国家不再是所有重要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者和提供者,社会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资源和机会获得的源泉。全民所有制以外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并成为学生就业的重要平台和渠道。社会身份划分标准发生剧变,各种具有自致性、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逐步形成,并成为新一代的就业追求。在此之下,个体作为教育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凸显,进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构筑人生梦想,成就出彩人生。

不过,在这种政策之下,个体所在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开始对教育获得及能力分化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小学入学机会的影响较大,而对其小升初、初升高的机会的影响有依次降低的趋向”;“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资本对子代升学机会的影响不因教育机会总量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在教育扩展到接近饱和状态时也未见有下降的迹象,而是表现了明显的加强趋势。”^[9]其中,户籍、家庭财产状况、居住地等先赋因素的影响清晰可见。不同家庭背景下人生出彩的机会是多质性、不公平的,由此导致进城农民工子女平等就学难、流动子女异地高考门槛高、大学生就业“拼爹”以及“寒门难出贵子”等现象。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育利益重心下移所实现的地区、学校、个体之间的教育利益分化,实现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分享。这种分享打破了国家的教育利益垄断和少数阶层和特定人群的教育利益专享,是教育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和社会进步。但这种分享在对象、程度和获得路径等方面存在着非均衡、差序化和多质性等诸多局限。这些在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来合理解决。

二、由分享走向共享 教育利益分化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

诚然,以教育利益分化为进路的教育改革,在本

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机制。它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使不同教育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冲突日益突出。其所释放的人生出彩机会由一部分人分享,而难以为每个人所共享。甚至引发一部分人“出彩”意味另一部分人“出局”的情况。在教育改革和发展新形势下,实现人生出彩机会由分享走向共享,需要进一步破除教育利益分化所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

1. 入学机会供给的体制机制障碍

入学机会是实现教育成层的最基本前提。入学机会供给存在非选择性入学和选择性入学两种机制。两者分别适用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就前者而言,现阶段问题的焦点在于法律规定“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与高烧不退的“择校热”之间的冲突难解。其实质是不同学区和学校存在明显的教育利益差别。其中“户籍所在地”、“就近”的规定,变成学生非选择性入学的两道限制性甚至强制性屏障,成为其享有均等教育机会的束缚。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入学机会的供给方式上存在缺陷,特别是城镇化及人口流动带来流动就学的频繁发生,如何实行跨越城乡、区域协同治理,以增强入学机会供给的可移动性、便利性和公平性,还存在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就后者来说,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性招生计划和刚性的招生政策下,高一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居于主动和优势地位,使受教育者入学机会存在一种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同时,政策的决策主体、实施与政策的利益主体之间,缺乏信息对称和地位权利的平等沟通平台,导致入学机会选择缺乏空间、自由度,学校与学生缺乏相互选择的多样性和匹配度。

2. 教育结构衔接融通的体制机制障碍

就目前而言,虽然义务教育“重点校”、“重点班”在政策和法律上都被明确取消,但由历史积淀和政策惯性形成的所谓“名校”,仍然是优质教育资源(如“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等)的聚集地,成为择校的主要目标。如何消解义务教育“名校”(尤其是公办名校),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消除学校分层带来的教育过度竞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非义务教育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教育分流和分层过于注重人的素质能力“量”的差别,而忽视人的素质能力之间“质”的差别,以分数高

低及分数线来划分不同学生进入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学校,而疏于学制分流及学校类型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在初中后和高中后的分流机制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无论是入学标准还是获得高一级教育的机会都低得多,两者相互隔离和脱节,导致职业教育难以获得与普通教育相匹配的学制地位,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往往是学生无可奈何的选择。虽然《教育规划纲要》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2015年《教育法》修正案提出:“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衔接融通”。但就其现实而言,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无论是入学机制还是教育过程和学习成果的认可,仍然缺少公平、开放和便利的衔接融通途径、标准和方式,以实现对等互认和互转机制。

3. 教育-就业衔接的体制机制障碍

如果说前两种体制机制障碍是起点性和过程性的,那么,教育-就业衔接的体制机制障碍则是一种结果性障碍。根据阿兰·C·柯兰霍夫的研究,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进而实现就业,其实质性差异主要来自三个根源,即教育系统的分层化程度、教育计划的标准化程度;授予的教育证书是普通的学术证书还是与特殊职业相关的证书。^[10]三者间的特定结合,形成教育证书与职业岗位之间的特定联接模式。与西方一些典型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制度体系具有高分层化、低标准化和教育证书分化度高的特点。高分层化表现在高等教育从“985”到“211”、部属院校、省属高校和省市共建高校,以及所谓“一本”、“二本”、“三本”的录取批次和证书层级差异;而且,普通教育高于职业教育的地位(虽然职业教育也有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这导致不同层级和类型学校给毕业生传递的身份文化差异巨大,形成就业市场的“校历主义”和院校歧视,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名校情结”和应试教育倾向。低标准化是指除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其它层级和类型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一直缺乏比较统一的教育标准,至多是教学指导委员会确立一些指导性标准。这种低标准化导致很多学校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相关行业及用人单位的认可,毕业生难以参与就业市场的平等竞争,助长了“校历主义”和院校歧视。此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截然分立,两种证书所代表的教育成

就与毕业生首份工作的职业层级之间连接度低。职业教育证书虽然与职业体系的对应性强,但其蕴含的文化资本明显低于普通教育证书。这必然导致一部分人难以通过教育实现高质量就业,成就出彩人生。

总之,人生出彩机会的非均衡、差序化和多质性分享,根源在于教育利益分化所导致的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教育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和隔离性,像道道关卡和闸口,将不同教育利益主体区隔在不同的利益区间内,难以公平地共享到人生出彩的机会。

三、教育利益整合:构建人生出彩的机会共享机制

如果说教育利益分化实现的是人生出彩的机会分享,那么,让每个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则需要通过教育利益整合,以构建公平公正的机会共享机制。应当说,教育利益分化与整合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双桨”,对人生出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只是在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确立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在新形势下,针对教育利益分化形成的教育利益差别、矛盾和冲突,需要通过教育利益整合,拆除突破利益固化的制度藩篱,为人生出彩构建公平公正的机会共享机制,以此促进教育系统各部分与层次之间的协调统一、衔接融通,增强教育系统的一致性、融通性和整体性。

1. 保障性机会共享机制

保障性机会共享机制是针对教育利益分化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和家庭背景下的教育起点不公平,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提供普惠、均等和可持续的教育保障。它是由公共财政保障教育经费支出,国家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可及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是社会福利体系和教育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的《教育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一款,将教育公平上升为国家行为,均衡发展上升为整个教育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将均衡发展由原先的义务教育拓展到义务教育、普惠性幼儿园、高中阶段教育、残疾人群特殊教育、民族教育等广泛领域,并明确各个层级和类别基本公共教育的保障范围、程度和重点。这为保障型教育

机会共享机制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基础。

应当区分的是,保障性机会共享机制分为普惠型和补偿型两种。普惠型机会共享机制适用于义务教育,补偿型机会共享机制则适用于其它层级和类型的基本公共教育,两者在保障程度和方式上有所区别。就前者而言,应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等保障主体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高政府对师资、经费、信息化等方面的要素保障水平,填补长期以来地区之间教育利益分化带来的教育发展的“凹地”和“短板”。伴随居住证制度的改革,政府应革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供给机制和方式,保障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同时,及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并轨、标准合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一体化。补偿型机会共享机制的构建,则应进一步加大对特殊类型地区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扶持力度,将教育扶贫纳入国家扶贫攻坚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托底供应和精准保障,以弥补这些区域或群体在先赋或后致因素上的局限,获得与其他区域或群体平等的发展机会。

2. 竞争性机会共享机制

从终极意义上说,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系恩格斯指称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11]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享”,只能是一种“差异性的共享”。^[12]这种共享不是走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道路,也不是搞平均主义的劫富济贫,而是要以全体人民的共建共创为基础,使每个人获得付出与回报成适当比例、各得其所的人生出彩机会。尤其是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一种后致因素,更多地依赖个体自身的努力和能力。竞争性机会共享机制的构建,正是为教育成层及共享人生出彩,提供一种公平竞争的机会、平台和规则。

首先,应消弭各种外在的身份因素如城乡、地区和户籍等因素对教育机会和资源获得的限制,尤其要完善义务教育学籍流动管理机制,改革高考分省定额制、中考县区定额制,避免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受到户籍、居住地等因素的制度性区隔。以此破除制度藩篱,建立底层人群在竞争性教育机会获得上的补

偿和救助机制。目前,国家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扩大重点高校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招生规模;各地实行省市示范高中招生指标按比例切块分配到校,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不得设置最低录取控制线,市(区)、县(区)内示范高中联合招生,按生源成绩平行分配,逐步形成示范高中公平竞争机制。这些政策都为竞争性机会共享机制提供了实践范例。其次,在教育-就业衔接机制上,应消除各种用人制度中的身份因素限制,破除社会底层人群在获得国家掌控的公共职位上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以能力为本的教育选拔机会、用人选拔机制和流动考评机制,使各个阶层和人群获得同质同等的公平竞争机会。再次,消解公共职位与非公共职位在工资收入、社会声望、发展前景及参与政治生活上的制度性不平等,使不同所有制下的各种社会组织都能成为创新创业和实现人生出彩的广阔舞台,实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平等发展。

3. 融通性机会共享机制

新修订的《教育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增加了“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衔接融通,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法律内容,切中了新时期以来教育利益分化形成的学校差序格局,促进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融通”。这为打通教育过程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人生出彩的融通性机会共享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具体而言,融通性机会共享机制的构建,首先要改变在教育分流上过于注重人的素质能力“量”的差异而忽视“质”的差别,消解单一的学校分层体制,强化学校分类发展、办出各自特色和优势,引导各级各类学校争创多元化的一流。其次,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消除高校招生分批次录取所导致的“校历主义”和院校歧视,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再次,改变“入学即毕业”的僵

化体制,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在入学后各教育环节完善分流机制,建立灵活而公平的转学机制和学分互认制度,促进不同学校之间等级界限的淡化与弱化,使不同起点和背景的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生涯规划,选择不同的学校和专业。^①鼓励学生选择多种成长成才的机会通道,使之获得各具优势和专长的教育成就。另外,完善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的学分转换机制,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向互认、纵向流动,认可多种学习成果,从而为每个人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创造更加公平、灵活和便利的机会通道。

4. 协同性机会共享机制

教育在对社会纵向流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流动机制及各种社会政策的制约。“教育改革不能取代社会改革。”“为了实现在生涯中和生活质量上更大的平等这一长远目标,应当在一个含有学校但比学校更加宽广的背景中,即在整个社会中采取行动。”^[13]因此,构建人生出彩的机会共享机制,需要加强教育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协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将教育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下统筹推进,将教育与就业、收入分配等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衔接起来。如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些政策将从就业、收入分配等重要环节上,为共享人生出彩机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民生保障机制及压力纾解路径研究”(BFA140043)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马琳琼)

注释

①2015年8月笔者访问俄亥俄州高等教育厅,了解到该州每年有40000学生成功转学,该厅转学咨询与服务为学生节省了8000万美元。该厅与各大学订立协议,达成校际之间学分互认和转学的框架。大学教授之间通过商谈,在课程科目、内容、质量、任课教师资质等方面形成互认的条件与标准,学生通过教育厅网站所明确的各校之间可以互认学分的课程,实现对等互转。这样,学校之间的等级界限被打破,大大改变美国社会的教育价值观,学生的选择空间和发展空间极大拓展。同时,大学对学院和系主任的考核,在重视科研项目成果的同时,主要根据注册学生数和学院选课(学院开课)的多少,以及能够把学生留得住,直到学生毕业和顺利离开学校、实现就业。这种自由选择的机制对学校、学院和教师都是一种严峻挑战,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27/c1024-23051129.html>.
- [2]习近平.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23/c1024-25188997.html>
- [3]李景鹏.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J].理论界, 2013 (9) :11-13.
- [4]刘金伟.“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J].理论界, 2013 (9) :11-13.
- [5]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课程·教材·教法, 2015 (9) :83-89.
- [7]刘海峰,李木洲.高考分省定额制的形成与调整[J].教育研究, 2012 (4) :48-66.
- [8]王威海,顾源.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J].社会学研究, 2012 (4):48-66.
- [9]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 2008 (5) :101-116
- [10][德]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学手册[M].傅松涛,孙岳,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99.
-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889.
- [12]李占才.共享发展的思想内涵和实践导向[J].湖湘论坛, 2016 (3) :5-12.
- [13]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79.

Constructing Opportunity Utilizing Mechanism in Brilliant Lif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Interests

Ruan Chengwu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brilliant opportunity of life released by education interests' differentiation is a kind of sharing of non equilibrium, different sequence and multi nature. From sharing to common utilizing, there are many barriers of mechanisms likethe supply of enrollment opportunities, interrelation and inter-mediation of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o this end,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interests, break the barriers of mechanisms formed by differentiation of education interests, enhance the consistency, compatibility and integrity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struct mechanism of opportunity common utilizing in brilliant life, which includes: security mechanism of opportunity common utilizing,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opportunity common utilizing, compatibility mechanism of opportunity common utilizing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opportunity common utilizing.

Key words: brilliant life, mechanism of opportunity common utilizing, differentiation of education interests,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interests